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CSSCI 来源期刊
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简 报

2013 年第 6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3 年 11 月 18 日

编者按

1.互惠理性视角下的企业制度观察.....	严维石
2.利益被侵害时，中小股东为何选择“理性冷漠”？.....	郑秀田 许永斌
3.价值决定新论.....	冯金华
4.我国农业扭曲状况分析.....	李淑静 崔凡
5.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宏观消费效应研究:模型、方法与数据.....	王宋涛 吴超林
6.提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张先锋 卢丹 陈琦
7.我国政府采购拍卖的定价机制研究.....	王群勇 柯岩
8.技术差距与我国出口质量升级.....	王明益
9.进口技术复杂度如何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	陈健
10.产业集群视角下在华外资研发公司区位战略的差异性分析.....	余珮
11.基于金融生态环境主体异质性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	王东明 黄飞鸣
12.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一项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研究.....	陈启斐 吴建军
13.银行业管制放松与中小企业融资.....	黄燕辉
14.高房价，银行有利可图.....	龚潇潇 王朝晖 洪志兴
15.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稳定性研究.....	张东祥 刘斯文 张标
16.公司避税活动与管理层寻租.....	陈冬 唐建新
17.股市有限参与之谜.....	尹志超 黄倩
18.贸易持续平稳增长的新方向.....	张凤 孔庆峰

《经济评论》简介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面向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把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经济理论探索

1. 互惠理性视角下的企业制度观察

严维石（广东财经大学）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信息范式：困境与出路——基于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批判》，
《经济评论》2013 年第 6 期

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古典经济学的个体理性主义分析传统引入企业制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发展喜人，他们将企业雇主、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理解为利益博弈的民事关系，而不再认为雇主与雇员之间存在“超经济”的强制关系（比如剥削关系）。这是他们对企业理论研究的贡献之一，然而，在个体理性主义世界里，企业雇主、管理者与劳动者之间因不完全与不对称信息使得他们之间的博弈陷入机会主义行为困境，阻碍了信息、知识与技能在企业内部交流与合作，这时，企业制度效率问题就凸现出来了，新制度经济学认定企业代替市场的效率理由就值得商榷。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个体理性主义理念必然像市场一样面对信息发送和知识与技能交流的困境。对于信息、知识与技能提供方来说，信息、知识与技能的特征本身要求它们交易或交流的相关支付发生在交易或交流之前，否则它们的接收方就会发生不支付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对现实资源稀缺性与市场中孕育企业使得经济学家相信，企业制度相对于市场存在某种克服此问题的机制，相关理论研究已经展开，不完全合同理论和委托代理的激励约束理论等就是经济学家这方面探索努力的一部分。然而，在个体理性主义的理念下，克服与缓解因信息发送与传递问题而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安排不可避免产生新的信息问题与机会主义行为，最终日益复杂的企业制度安排将窒息企业效率与活力。值得庆幸的是，现实中的企业没有像个体理性主义理论逻辑分析那样，企业制度安排过于复杂而窒息，高效企业比比皆是。逻辑上讲，现实的企业内部雇主、管理者与雇员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是建立在新制度经济学坚持的个体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否则这些企业不可能有效率，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

个体理性主义使得个体丧失生理性与社会性。而现实的企业中个体不仅具有生理性，也有社会性。其生理性表现在，没有人能够掌握全面信息、知识与技能，也没人不受计算能力限制，即人只能处理有限信息与进行有限计算；而社会性则是人一个群体性的，孤独是人的敌人，社会性交往是人的生存与发展基础。人的社会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其生理性局限，神经科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成果显示，人的一些社会行为具有经济功能，可以实现高效经济效果，群体内的互惠合作就是其中之一。

相对于个体理性主义，群体内的互惠合作则是基于互惠理性，不同在于，较高互动频率使得无需产权界定与交易支付的互惠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得到抑制，效率优于个体理性

主义中的产权界定与交易支付。因此，在小群体中，互惠合作中的互惠理性是可以实现的。资源稀缺性与市场中孕育企业本身表明，企业制度相对于市场存在某种效率优势。逻辑上，企业制度没有任何效率优势，则不可能在竞争的市场中产生。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发现，但它将效率优势归功于行政管理缺乏说服力和逻辑性。在企业内，小群体中的个体出于互惠理性而进行的互惠合作使得信息发送与传递、知识与技能交流成为可能，也成为必然，企业优于市场交易的效率优势不是行政管理，而是互惠合作。

2. 利益被侵害时，中小股东为何选择“理性冷漠”？

郑秀田 许永斌（浙江工商大学）

《控股股东攫取私利下中小股东的行为选择——“理性冷漠”还是“积极监督”？》，《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

我国证券市场上的很多上市公司的股权不是分散而是相当集中的。在这些公司中，持股占据多数且处于优势地位的控股股东可以通过控制或影响董事会或管理层，主导制定和实施上市公司战略、经营、管理等决策，从而对公司的财务绩效产生重大影响。当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利益保持一致时，控股股东会兢兢业业地为公司谋发展和为全体股东谋福利，然而当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控股股东往往会将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甚至是做出假公济私的行为。控股股东运用手中所掌握的控股权进行中饱私囊行为的后果就是上市公司利益将遭受到损害，同时表现为中小股东利益的被侵害。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的证券市场上中小股东利益被侵害事件的发生更为频繁。令人惊奇的是中小股东在利益被侵害时常表现出冷漠的态度，“用脚投票”是最常见的行为，甚至他们选择销户，并在离场的同时带走了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希望。严峻的事实不禁引发我们对如下问题的思考：如何遏制控股股东非法攫取利益的行为？事实上，除了激励控股股东提高道德水准外，遏制他们非法行为最好的手段之一就是外部监督。理论和实践经验表明，由于监督的存在，掌握控股权的控股股东想要为自己谋私利将付出更高的成本。毕竟当在监督的“鹰眼”和惩罚的“大棒”都齐备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们想要通过牺牲他人和公司的利益为自己谋福利，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做贼心虚的。在此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既然监督是有效果的，那么当自身利益受到控股股东侵害时，中小股东怎么就选择了“理性冷漠”，选择了“用脚投票”，甚至选择暗淡离场，而不是积极监督呢？

这个问题可以用“搭便车”理论进行解析。“搭便车”问题在该情景下可以认为是当存在众多股东时，对控股股东行为的监督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每个中小股东都希望由其他股东行使监督权和承担监督成本，而自己则可以从他人的监督行为中免费获得收益的倾向。最终的结果是无人愿意行使监督权。事实上，除了中小股东持有的“搭便车”心理外，他们对公司的持股比例、监督成本等也是影响其行为的因素。一般来说，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与监督意愿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当股东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越高时，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自利行为的监督意愿越强。现实的情况是，中小股东之所以为中小股东，是因为他们

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是非常低的,甚至低得可以忽略不计。由于中小股东的持股比例太低,因此面对控股股东侵占其利益的行为时,大多数中小股东对此表现出的“理性冷漠”也就不难理解了。再比如说,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自利行为的监督意愿会随着监督成本的增大而降低。在一个法律对中小股东保护不强的国家中,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的监督成本往往是很高的。中小股东如果考虑到收集信息、组织联合行动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那么采取积极参与和监督的行为往往都是非理性的。

总之,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是相关政府监管部门的职责所在。因此,这些部门一方面不能放松对控股股东中饱私囊行为的监控,另一方面更不应该对那些合法利益被侵害时中小股东们所表现出的“理性冷漠”视而不见。毕竟当自身合法利益一次又一次地被侵害时,那些选择“用脚投票”的中小股东们终究也会伤透了心的,于是选择销户离场将会是他们最为理性而又无奈的选择。毋庸置疑的是,大批中小股东们满怀希望地进场之后满腹委屈地离场将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障碍。由于监督能够约束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因此政府相关部门一方面需要对这类行为进行严格的管控和惩罚,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从降低中小股东监督成本等方面着手,努力营造激励中小股东监督意愿的制度与法律环境。

3.价值决定新论

冯金华(上海财经大学)

《社会总劳动的分配和价值量的决定》,《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

商品的价值量等于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进一步来看,社会必要劳动量又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就是:“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

然而,长期以来,在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上,一直存在许多的误解。最明显也最常见的一种误解是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割裂”开来,即认为,只有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涉及既定价值量的“实现”,而与该价值量的决定无关。

另外一种误解是,虽然承认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同样决定商品的价值量,但却错误地认为,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不同的价值量: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某种商品的全体即整个行业的价值量”。

最后,尽管也有一些人正确地认为,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同时决定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但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把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统一起来,并用这种统一的同时包括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去说明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更不知道如何从数学

上去说明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上的不同作用,有时甚至还可能滑入供求决定论的泥沼。

实际上,在假定等价交换以及一国经济的价值总量等于劳动总量的基础上,容易推导出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具体表达式。根据这一表达式,任意一种商品的单位价值量都等于一国的劳动总量乘以该商品的价格与整个经济的价格总额的比率。

特别是,根据这一表达式,一方面,任何一种商品的单位价值量都同时需要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另一方面,在共同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前提下,不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具有不同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在给定一国经济的劳动总量之后,首先可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劳动总量在不同行业中的分配,即决定每一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价值量,其次再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每一行业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价值量在其所生产的每一商品上的分配,即决定每一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单位商品价值量。

根据这一表达式,还可以得到如下几点结论:首先,任意一种商品的单位价值量随其价格的上升而上升,随其他商品价格的上升而下降,随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下降。其次,由于任意商品的单位价值量不是取决于生产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量,而社会必要劳动量又取决于该商品的价格与价格总额的比率乘以一国经济的劳动总量,故对任意商品来说,即使生产时投入的劳动量很小,但如果其价格与价格总额的比率很大,其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亦会很多,从而,其价值量亦会很大。反之,即使生产时投入的劳动量很大,但如果其价格与价格总额的比率很小,其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亦会很少,从而,其价值量亦会很小。最后,供求关系的变化会影响一国经济的劳动总量在不同行业中的份额,从而影响这个份额在每一单位商品上的份额,即影响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但这并不意味着供求决定价值——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仍然等于其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即仍然是劳动决定价值。供求关系的变化只有通过影响劳动总量的分配才会影响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否则就不会具有这种作用。

中国经济研究

4. 我国农业扭曲状况分析——基于世界银行农业扭曲指数数据库的考察

李淑静 崔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评论》2013 年第 6 期

由于农业的多功能性及特殊性，其在国民经济中一直占基础性地位，即使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农业问题一直备受重视。一国国家农业政策往往与经济发展程度高度相关，发达国家往往对农业采取保护的态度，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采取以牺牲农业利益来换取工业发展的态度。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出于对工业发展的迫切需要，早期实行的是农业反哺工业的政策，这一政策造成了我国农业严重扭曲的状况，大大削减了农民的福利，使得我国农产品价格低于国际价格，这种负保护直到最近几年才慢慢得以改变。那么如何衡量一国贸易政策及国内政策所致的农业扭曲程度呢？如何衡量农业政策所致的贸易和福利改变情况呢？目前，比较常见的是 OECD 开发的农业支持政策评价体系，即 PSEs 和 CSEs，虽然这些指标能量化农业支持程度，但它有不尽如意的地方，比如这些指标主要用于衡量高收入国家对农业的支持程度，较少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支持程度。

世界银行开发的农业扭曲指数数据库克服了 OECD 农业支持政策评价体系的上述缺陷，它主要包含 NRAs（名义支持率）和 CTEs（消费者等值税）等基础性数据，以及 TRI（贸易减少指数）和 WRI（福利减少指数）等补充性数据。通过使用该数据库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农业实行负保护，这集中体现在 NRA 为负值，不过随着我国政策向农业的倾斜，负的 NRA 开始逐步减少，并且在 1995 年之后变为正值。这与我们国内政策和贸易政策密不可分，我国国内政策的最大特点是高保护价敞开收购政策的执行，国家粮食定购价从新粮上市起提高 40% 左右，它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实质性地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我国在 2001 年底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而此前为加入所做的工作就体现在贸易政策更加自由化，进一步放开农产品进出口市场，2006 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标志着我国对农民的征税成为历史，对农业的支持逐步增加，具体体现为 NRA 一直在稳步增加，在 2005-2010 年度名义支持率增加到 10% 左右，2006 年之后的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政策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农业政策逐渐由征税变为补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开始走向工业反哺农业的道路。通过分析 CTE（消费者等值税）可以看出农业政策对消费者的价格扭曲情况，经过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在 80 年代初期对消费者一直进行补贴，这一现象到 1995 年开始变化，国家开始对消费者进行征税，用来补贴农产品生产者，在 1995-1999 年间对消费者的税收最高，值约为 582 亿美元。

利用 TRI 和 WRI 可以分析我国农业贸易和福利变化情况，在 80 年代初期，我国 WRI 和 TRI 值处于较高的水平，分别在 55% 和 46% 左右，说明我国改革初期的政策对贸易和福利的抑制效应，当时所实行的政策具有严重扭曲贸易和福利的作用，随着我国政策的改革，

对农业的扭曲作用减少,在 1995 年之后,我国的 TRI 和 WRI 在 0-10%之间进行波动,特别是在 2010 年,我国的 TRI 转为负值 (-5%),说明我国实行的政策具有贸易促进作用。另外,不同农产品所引致的贸易减少和福利减少效应不同,我国应根据不同农产品的贡献率来决定具体策略,以便减少农业扭曲和增加贸易量。

总的来讲,我国农业贸易扭曲程度正在逐步减少,我国政策也正往补贴农业方向倾斜,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对农业问题的关注,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正逐步走向工业反哺农业的道路。

5.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宏观消费效应研究:模型、方法与数据

王宋涛(汕头大学)、吴超林(华南师范大学),《经济评论》2013 年第 6 期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相伴随,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日渐扩大,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 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474,而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2010 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则高达 0.61。虽然对基尼系数的调查和计算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中国已经进入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的阶段。

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不但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其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也造成一定的影响。近年来中国的内需不足,有一部分就是消费需求不足所导致,而收入不平等,则是造成居民总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居民收入不平等对总消费的影响不足,可称之为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宏观消费效应。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宏观效应的争论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什么微观条件下,收入不平等具有负的宏观消费效应?如凯恩斯早就指出,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时,收入不平等具有负的宏观消费效应,而我国学者杨汝岱和朱诗娥则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无法保证收入不平等具有负的宏观消费效应。第二,该如何检验和计量收入不平等的宏观效应?一般而言,通过使用基尼系数和总消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对收入不平等与总消费的关系进行检验。但由于基尼系数面板数据的难获得性以及传统回归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检验和计量收入不平等的宏观消费效应显得尤为困难。

事实上,通过使用基于特定收入分布(如经典帕累托分布),利用洛伦兹曲线函数的特性,可以容易构造出一个包含基尼系数的宏观消费函数,利用此函数,可以严格地证明:“当且仅当”微观消费函数为凹函数时,收入不平等具有负的宏观消费效应;在这种情形下,缩小收入不平等可以提高总消费。利用包含基尼系数的宏观消费函数,还可以轻易推导出一个“收入不平等的消费损失公式”以及“收入不平等变化对居民总消费变化影响的差分公式”,这两个公式相对于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具有两个优点:一是不需要大样本的基尼系数数据,只需要基尼系数的“点数据”,就可以直接计算收入不平等的总消费损失以及基尼系数变动对总消费的相对影响,二是不需要进行传统回归分析的显著性及其他各种检验,而是直接的一种

计算结果。

基于宏观消费函数,使用中国的基尼系数数据和消费数据进行运算,结果表明:1996-2010年期间,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导致的绝对消费损失年均为1383.56亿元(1996年价),损失率为2.68%;由于基尼系数增大导致居民总消费下降510.9亿元,占居民总消费变化值的1.06%。如果考虑基尼系数测算的低估,实际上,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总消费损失将大得多。

总而言之,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具有负的宏观消费效应,其不但会影响社会稳定和谐,也是造成居民总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缩小居民收入不平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6.提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张先锋 卢丹 陈琦(合肥工业大学)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贸易自由化——基于中国2000-2010年制造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

近些年来,国际市场波动对国内经济及劳动力市场的冲击越来越明显,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冲击程度的大小是决策者在制定我国对外贸易政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那么,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劳动力市场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的高低)与贸易自由化(关税及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降低)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是指劳动力市场在受到外部冲击时通过工资、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等途径迅速调整以恢复到均衡状态的能力。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受到国际市场波动(诸如次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等)的冲击时,劳动力市场通过工资、劳动力就业数量等渠道进行自我调整的能力;(2)劳动力市场中企业雇佣、解雇成本的高低;(3)劳动力从一个行业流向另一个行业所遇障碍的大小;(4)劳动力灵活就业的能力。一般而言,劳动力市场越灵活,意味着企业雇佣、解雇成本越低,劳动力的流动障碍越小,劳动者灵活就业能力越强,面对外部冲击时,劳动力市场的调整能力越强和调整速度越快。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加深,国内市场面对国际市场的外部冲击越来越大,如果我国劳动力市场越灵活,就意味着越容易将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重新配置到生产效率高的部门,并促进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较高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也是一种比较优势,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成为促进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与广化的重要因素。

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同时存在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一方面,自由贸易会促使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规则进一步向国际规则靠拢,在劳动力市场上减少行政干预,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增加企业用工的自主权及劳动者的劳动选择权(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及工作时间等)等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国际劳工标准的推广,在为工人提供就业保护,提高劳工标准的同时,也增加了劳动力的调整成本,减少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另外,随着竞争加剧,厂商不断进行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这种高技能劳动力“短缺”与低技能劳动力“过剩”所造成行业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也会导致行业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降低。

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与贸易自由化到底是什么关系?需要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通过对我国 2000-2010 年制造业 27 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我们发现,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提高能够促进贸易自由化,而贸易自由化的推进也能够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这个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在“就业是民生之本”的政策背景下,经济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程度是我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考量因素。一方面,我国应该加快清除劳动力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流动障碍的步伐,构建有利于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的社会经济环境,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设更为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提升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从广度与深度上进一步推进我国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我国应通过对外开放与贸易自由化,按照国际规则与惯例,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改革与完善现有的劳动制度与政策,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宽松的劳动力市场环境。

7.我国政府采购拍卖的定价机制研究

王群勇 柯岩(南开大学),《经济评论》2013 年第 6 期

政府采购作为我国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节约财政资金、引导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其价格更是受到政府与百姓的广泛关注。

而目前我国政府采购价格虚高已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使得《政府采购法》中“政府采购价格应低于市场平均价格”的规定变成了一纸空文。建立政府采购价格监测体系,使之成为遏制政府采购价格虚高的一道防火墙是当前采购部门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和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价格监测的核心是界定商品的合理采购价格,然而这一价格不简单等同于商品的出场价格或市场价格。面对庞大的市场与繁杂的采购对象,决策者也很难判断什么样的价格是“合理”的。在此,我们可以利用拍卖理论,预测公平竞标情况(即没有腐败共谋、围标串标等现象)下的成交价格,以预测价格为标准,约束实际采购价格,实现价格监测的目的。

众所周知,采购价格会受到市场环境、采购规则、投标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竞标中,理性的供货商往往会权衡中标概率和中标后的收益,采取统一的报价策略。而采购部门则可以应用经济学中的博弈理论对供货商的报价行为进行预测,从而估计出最终的成交价格。

研究表明,供货商在报价时主要受两类因素影响,一是实际供货成本,二是竞标失败导致收益损失的大小。最终成交价格则主要受到供货商的平均成本和投标竞争的激烈程度的影响。其中,竞标激烈程度则与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企业成本差异和订单规模等因素息息相

关。

基于这一思路,我们自 2011 年开始对天津市电子信息类产品进行市场调研,与几十家供货商进行了访谈,利用同一期间天津市政府采购中心的投标数据研究了我国政府采购的定价机制。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利用历史数据对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探究。

结果表明,不同因素会通过影响企业提供标的物的成本及招标竞争的激烈程度影响企业报价的期望值和差异程度,最终决定政府采购成交价格。企业间差异越大,各企业报价越分散,则越容易出现较低的成交价格;竞标人数或竞标品牌的增加会使竞争更加激烈,有助于降低成交价格;采购数量越多,则企业没有中标的损失就越大,其报价也就越低,从而成交价格也就越低。

上述结论提供了一种对投标(逆向拍卖)报价的简便预测方式,为政府采购价格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评判标准,进而为我国建立政府采购价格监测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可行的思路。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各地采购政策拍卖规则因地制宜,这一模型还需结合实际进行进一步修正和调整,仍具有很强的扩展性。

8. 技术差距与我国出口质量升级

王明益(山东财经大学)

《内外资技术差距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研究——基于中国 7 个制造业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评论》2013 年第 6 期

长期以来,我国凭借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着重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及出口。然而,近几年伴随着国外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调查的增多,人民币的升值,国内原材料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等因素客观上削弱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出口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显得很有意义。因为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可以避免国外的反倾销调查,有助于从低水平的价格竞争向高端竞争的转变,实现更多的经济效益,改善出口结构及产业结构,带动经济增长。

受当前我国国内研发水平所限,目前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主要还得依赖外来技术。而吸引外资则是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最主要方式之一。我国自 1992 年以来开始大规模吸引外资,外资的进入促进了当地出口增加,增加了税收,带动了地区经济增长。然而,外资的大规模进入是否带动了我国出口质量水平的提高呢?如何充分、有效地通过吸引外资来促进我国出口质量升级呢?笔者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篮球初学者想提高自己的篮球水平,他需要找一个人教他,理论上他可以找美职篮巨星,也可以找本单位(或本地区)打篮球比较好的人。那么,是否他找美职篮巨星比找一个篮球爱好者效果好呢?笔者认为,他若找一个美职篮巨星教他的话,美职篮巨星因为水平很高,他很可能会传授这位初学者一些妙传、突破、抢篮板等绝招,但这位初学者能学得来吗?他连简单的运球过人动作可能都不会,怎么可能学会这些高超的技术呢?相反,他找一个业余篮球爱好者教他可能更合适,因为后者会着重

教自己一些最基本的篮球技术（因为太高超的技术他也不能掌握），这样初学者会较容易地学到一些篮球基本技术。

通过吸引外资来提高我国出口质量水平也是同样的道理。因为若技术差距过大，内资企业根本无法吸收先进技术；技术差距过小，学不到太多东西。简而言之，从技术差距比较适中的外资那里学习、模仿其先进技术效果会更好。我们利用 1992-2012 年我国制造业 7 个代表性行业为研究样本进行经验研究，其结果证实了这个观点。那么，下面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样的技术才是适中（或合理）的？是不是只要技术差距合理，内资就一定能够掌握其技术呢？我们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技术差距合理与否的检测方法有多种。作为内资企业的技术人员，可以集中接受先进技术学习、培训，看其是否能掌握。若能掌握，说明技术差距合理。若掌握不了，说明技术差距过大。刚才的例子中，初学打篮球的人就可以用这种方法验证教练是否适合自己。此外，学者们可以运用相关数据进行经验分析，从而检验出何等程度的技术差距对出口质量的影响是显著的。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答案是很显然的，技术差距固然对出口质量升级作用很关键，但仅有合理的技术差距是不够的，其他因素也不能忽视，因为它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出口质量水平。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内资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及制度因素等。人力资本水平影响着内资企业吸收外来技术的持久性，研发投入的高低影响到内资企业吸收外来技术的效率及强度，基础设施状况是外资能否长期投资的重要因素，而制度因素是一个企业高效、规范运营的保障。这些因素对出口质量的显著性影响同样得到了我们经验研究结论的支持。同样的道理，篮球初学者仅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教练还不够，除了跟教练认真学习篮球技术之外，自身的力量训练、饮食的营养结构、持之以恒的决心等因素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位初学者的最终的篮球水平。但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要请到适合自己的教练。

9. 进口技术复杂度如何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转移份额分解下的根源探析

陈健（东南大学），《经济评论》2013 年第 6 期

转型发展要求凸显我国当前大力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其显著构成进一步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战略抉择。与此同时，在我国深化对外开放过程中，世界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和服务领域国际分工合作关系向纵深拓展，不失为实现上述发展目标重要契机。

在充分考虑知识源异质性前提下，通过定量比较，研究首先揭示了我国同主要发达国家双边服务贸易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升级以及进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提升所体现“质”方面改善特点。整体而言，中国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两个服务子行业的进口相对技术复杂度明显高于其他四类。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进口相对技术复杂度在整个考察期限内均呈较稳定的上升趋势，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 以后的 2002-2006 年以及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后的 2009-2010 年阶段，对应的增长趋势更为明显。其次，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子行业进口相对技术复杂度在样本期内前半

段（2001-2006 年）也呈较明显上升；但此后 2006-2009 年则缓慢下降，2009-2010 年有所回调。进一步分析表明，技术复杂度水平相对偏低的四类中，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特点同样比较突出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进口相对技术复杂度变化，在 2005-2009 年间表现为上升趋势。批发和零售服务以 2006 年为分界点，受各国该领域创新研发投入水平显著下降影响，相对进口技术复杂度在 2001-2006 年是惟一显著下降的服务子行业，此后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服务业相对进口技术复杂度平均水平更低，在考察期内的基本趋势比较平缓，没有较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性表现。

借助转移份额分解法，研究进一步重点关注了进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状况和作用机制。借助转移份额分解分析呈现两大特点：其一，各服务子行业增长率水平提升的主要贡献来自组内增长效应，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表现尤其不俗。其二、配置效应和交互效应所体现的结构变动影响表现方面，人力资本要素和知识要素投入相对比较密集服务行业有不同程度表现，如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业。定量分析基础上的经验实证分析表明：作为服务贸易发展更“质”的方面，进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不断提升，对我国服务业发展而言，还是能够较好表现为促进作用的，突出体现在生产率水平提升影响方面。而制度方面的进一步改善，对于更好释放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带来的知识外溢，进而形成制度改善和进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协同作用下的服务内部结构改善，具有重要影响。

研究结论表明，全球服务贸易已呈现出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变的特点，我国在参与全球服务贸易领域分工合作过程中，应努力扩大技术密集型新兴服务在服务知识源异质性构成中的影响力和表现度，进一步发挥其“质”增主导功能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而在强化本土市场效应同时，更需要做的是充分挖掘和培养创新人才优势，进一步解除阻碍本土服务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实现内部服务结构更明显的改善。同时，我国仍需加快推进本土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功能细化与空间集聚高地形成，进而更好发挥其对外“窗口”效应。

10. 产业集群视角下在华外资研发公司区位战略的差异性分析

余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资 R&D 子公司在华区位战略的差异性分析——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经济评论》2013 年第 6 期

跨国公司研发（R&D）环节是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不同于以成本 and 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生产职能子公司，R&D 子公司的国际扩张注重东道地区的科学技术资源、人力资本以及市场完善程度，因此集聚在“欧洲-日本-美国”三大发达国家。然而，近十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高科技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打破了发达国家吸收研发类外资的垄断局面，据

不完全统计,截止 2010 年,外资公司在华设立的 R&D 子公司已达 1200 多家。因此,外资在华建立 R&D 子公司的驱动因素、地理分布以及区位战略值得关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省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形成了“东-中-西”阶梯式格局,制造业外资在东部地区的空间集聚所形成的累积循环效应,使中西部地区在招商引资时遭遇劣势,缩小区域经济不平衡是中国经济和谐发展的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经济发展方向,如何有效利用高质量外资,通过建立以大中型企业为核心、科技型小微企业为纽带以及科研院所为支持的产业集群,从而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尤其是制造业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

根据 OECD 官方定义,R&D 可划分为类型 R 和类型 D,分别指代“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和“应用开发”(experimental development),前者强调不以商业结果为目的的科学技术基础研究,旨在提高知识的累积,后者则指把已有科研成果转化成商业产品的过程,包括产品的特性、生产和设计过程以及配套服务等。类型 D 子公司以支持当地化生产为导向,往往采取跟随以生产为职能的子公司的区位战略,类型 R 子公司则注重东道地区的知识资源,如大学和科研院所。因此,R&D 子公司的区位战略因其类型而异,一般的产业集聚理论并不能解释这种差异性战略。

不同于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并不是企业简单的“扎堆”,而是除了地理邻近外,基于组织、知识、制度和市场邻近的集群内各部门之间关联的一种有机组织结构。在产业集群的框架下,我们选取世界 500 强企业中 78 家欧洲、美国、日本和台湾跨国公司在华 177 家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 R&D 子公司,2000-2011 年期间跨越 12 个省的区位选择为样本,结合公司层面微观数据和东道地区经济特征,定性和定量分析了样本公司的区位战略。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参考各省的地理位置以及区域创新体系,我们把样本省划分为华北、东南沿海、中西部三大区域,假设外资研发公司采取“区域-省”的分层选择逻辑,即先选定一个区域,随后在选定的区域中决定最后的东道省,区域和省级层面的经济特征均会影响研发公司的区位战略。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以中国市场需求为导向是外资 R&D 子公司的普遍战略,类型 R 和类型 D 子公司分别在不同区域采取“区域-省”的分层选择逻辑。“地理邻近”以及较高的外资研发密度、较低的相对劳动力成本可以促进类型 D 的投资,而“知识邻近”和基于自主创新的“组织邻近”会吸引类型 R 子公司,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人力、科技资源形成的“知识邻近”,以及对工业企业 R&D 重视程度所形成的“组织邻近”,将为该地区带来吸引以基础研究为主导的高质量外资子公司的机会。

基于上述发现,对中国各地区外向型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两点建议:第一,东部地区可以借助其在制造业的市场优势和产能优势,通过提升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而增加其对外资正向外溢的吸收能力。第二,中西部地区不能盲目采用以生产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应结合自身科技和人力资源优势,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基础研究环节,在防止人力资本外流的同时,引进海内外科技人才,从而提高科研院所综合研发能力,并积极与当地企业和外资企

业合作，借鉴发达国家发展高科技产业集群的经验，在科研院所基础上建立“种子”企业，建立产业集群的核心，形成“学-研-产”的逆向引资发展模式。

11.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主体异质性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

王东明（上海立信会计学院）、黄飞鸣（江西财经大学），《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

中国作为一个处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其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和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使得我国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在不同地区效果不一致，产生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问题。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问题的存在，降低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因此，探寻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形成机理，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当前关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从宏观层面出发，认为区域效应的形成是由于区域间经济结构或经济周期的差异；二是从微观层面出发，认为区域间银行结构或金融结构的差异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两种观点都强调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性，区别在于前者重视利率传导渠道的差异分析，后者重视信贷传导渠道的差异分析，但两种观点都忽视了制度和环境因素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因此，在强调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性环境的重要性基础上，从一个新颖的视角——金融生态环境差异、银行异质性（银行规模、流动性和资本化程度等）和企业异质性（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结构等差异）研究我国区域效应的微观形成机理，更有助于理解我国区域效应的内在形成原因。

一般来讲，在信贷渠道中，银行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上游”单位，企业是“下游”单位，金融生态环境则决定着传导过程的“河道”畅通与否，所以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效果依赖微观主体和传导环境的特征。第一，金融生态环境对信贷渠道的有效性有重要影响。金融生态环境包括有效的法律体系和健全的信用体系，具体包括法律制度、信用和地方政府行为等，均对信贷渠道影响显著。首先，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可以保证债权人有效执行契约，减少银行的损失，从而降低信贷配给水平，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其次，信用等非正式制度对银行信贷和信贷传导渠道影响也十分显著。完善的信用体系可以减少经济交易中摩擦，降低交易成本，并有助于信贷合约的达成。在完善的信用体系下，机会主义行为会减少，从而银行的甄别成本和监督成本会降低，从而扩大社会的信贷供给。最后，地方政府的“干预”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我国处于转型时期，各个地方政府地方治理水平不一，它们会出于自身业绩考虑，干预商业银行的信贷，并在“干预”货币政策传导中获取利益。第二，银行异质性对信贷渠道传导效率有重要影响。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银行的异质性使得其外部融资能力和风险管理态度会有所差异。具体来讲，不同类型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差异表现为：规模小、流动性差、资本化程度化较低的银行往往受政策冲击较大。第三，不同类型企业也会影响信贷可获得性。企业作为资金的需求方，信贷可获得性影响其投资和消费的变化，影

响着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最终效果。不同类型企业对银行融资的依赖程度不一样,具体依赖程度取决于企业的融资结构和融资能力,具体影响因素包括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结构等。

在我国,以上三者在区域间的分布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相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其金融生态环境优良,股份制商业所占比重较高以及中小企业所占比重较高。那么,三者的差异是否是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原因呢?基于此,通过对我国 29 个省市的实证检验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和银行异质性是我国货币区域效应形成的重要因素,前者尤为显著,而地区间企业特征差异也是导致区域效应的因素。因此,我国货币政策在东部地区的有效性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这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缓解区域效应的现实对策在于组建区域性商业银行,完善区域金融结构;长期出路在于完善金融生态环境。

12.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一项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研究

陈启斐 吴建军(南京大学),《经济评论》2013 年第 6 期

大量研究表明:高效的金融体系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完善的信贷系统可以将储蓄最大限度的转化为投资,帮助企业购置机器设备、租赁生产要素。跨国数据显示: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金融业在一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不断提高(布朗,2011)。经济服务化的重要特征是,金融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产业,通过发挥关联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进而刺激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说在现代经济结构中,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已经成为一国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相较于发达国家的“服务经济”,我国的第二产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步伐一直较为缓慢;同时,“四大国有银行”一直是我国金融的核心机构。产业结构和国家金融系统的“双重扭曲”,使得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缓慢,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艾伦等(2006)认为,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金融业存在很明显的滞后,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持。林毅夫(2006)提出“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假设,他认为在现阶段我国的比较优势依旧体现在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因此应该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目前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占主导的银行业是整个金融系统的核心,外围的中小金融机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优质资源以及国家的政策扶持上,都远远小于前者;同时中小金融机构片面追求高利润,风险控制较差,并且容易形成区域的债务链。2011 年浙江小企业债务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2013 年第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占整体经济规模的比重达 47.8%,首次超过制造业占比。随着服务经济的日益临近,提高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一,金融创新可以更加有效地将中国的高储蓄转化为投资,增加资本积累,带动经济增长(罗默,1986;卢卡斯,1988)。第二,新的金融产品可以增加消费者的投资渠道,避免盲目投资造成的短期经济泡沫;同时增加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第三,发展金融业可以有效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部门的改革,提高消费者福利水平。第四,金融创新可以增

加产品的过程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罗默,1990;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第五,通过金融体系可以调节收入分配,有助于国家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目前的金融体制下,金融业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关联?我国金融业的改革能否有助于经济发展?是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今后我国金融业改革方向的确定以及政策的制定。

在对我国金融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之后发现:由于存在较为严重的行政壁垒,目前我国的金融业无法为整体技术进步提供支撑。由于我国面临产业结构和金融业结构的双重扭曲,金融业的发展更多地为工业服务。为了降低流动性风险,金融机构更倾向为大中型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这就造成了金融业的发展与工业的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不利于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现有的金融体系已经不适应服务业占主导的产业结构发展需要。因此提高中小金融机构的行业份额,提高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是金融业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服务业的生产率进一步提升而工业的生产率会下降,并且总体的生产率保持上升态势。这意味着,经济服务化是有利于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服务业比重的上升不仅可以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还能带动服务业和整体生产率的上升。

13. 银行业管制放松与中小企业融资——基于进入管制放松视角

黄燕辉(厦门大学)

《银行业管制放松与社会福利、信贷供给——基于进入管制放松视角》,《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

国内外学者已经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明了银行业管制放松能够有效地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度。银行业竞争度的提高促使银行增加分支机构或提高服务质量等方式动员社会储蓄以获取更大的存贷款市场份额,不仅有助于将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生产资本,同时也增加了信贷市场资金供给。信贷市场资金供给增加使原先一部分没有能够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资金支持,从而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并促进经济的发展。我国银行业管制放松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恢复、重建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及中国工商银行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之后,1986年7月至1996年期间,先后成立了交通银行等十三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995年,国务院批准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城市商业银行;2001年11月加入WTO,取消外资银行外汇业务限制并逐步开放人民币业务;2003年6月,国务院提出将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等组织形式。银行业管制放松使得我国信贷市场资金供给不断增加,从我国金融机构历年贷款余额来看,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从2002年的13万亿增长到2012年的63万亿,10年间增加了近4倍。

银行业管制放松,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使民间金融阳光化从而减少地下金融活动,不仅对经济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在我国,民间金融属于非正规金融,游离于正规金融体制之外,并受到政府排斥甚至打压。然而在日本

和韩国等国家均有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民间金融机构，日本的地方银行、第二地方银行和韩国的地方银行均属于民间金融机构，主要服务对象是地方中小企业，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务院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决定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颁布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允许民间资本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组织就是一大举措。

不同的市场结构决定了商品价格的定价方式，在完全垄断的市场结构下，商品价格由供给方决定；然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商品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均为价格的接受者。也就是说市场化程度越高，商品价格越接近于市场所决定的价格，社会福利水平也相应得到提升。因此，银行业管制放松通过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度，使利率市场化机制发挥作用，从而有助于缓解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银行业管制放松以及利率市场化机制作用下，商业银行为了争夺更多储蓄份额，必然提高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增加了银行信贷资金成本。然而，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大型企业来说，银行讨价还价能力有限，因此提高国有企业以及大型企业贷款利率的可能性比较小或者提高的幅度非常有限；而对中小企业来说，银行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能够通过提高利率以转移部分资金成本。因此，银行业管制放松以及利率市场化使得银行主动或被动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从而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14.高房价，银行有利可图

龚潇潇 王朝晖（宁波大学）、洪志兴（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

《考虑投资者套现行为的住房抵押贷款期权定价模型》，《经济评论》2013 年第 6 期

住房问题一直被视为事关民生之大事。房价的居高不下则牵动着广大老百姓的心，他们希望政府出台有力政策调控房价，使其有所下降。然而“楼市十年九调，房价屡调屡高”，出现如此调控怪圈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房地产市场中的主要参与者——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房地产市场中主要的资金供给方，包括住房供需双方开发商和购房者的资金供给。因此，政府政策调控的有效性，最终还取决于银行实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额。

根据购房目的用途不同，申请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购房者主要分为自用型购房和投资投机型购房两类。银行承接个人住房贷款，该业务的盈利水平依赖于借款人的还款行为，正常还款、提前还款或者违约。而借款人的行为决策则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主要是利率和房价水平。

其次，根据利率和房价水平，经济环境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房价低于贷款余额。此时，自用型和投资型购房者均会违约，如近期温州等地房市陆续出现的违约潮。二是房价较高且中央银行连续加息。我国房贷利率根据央行公布的同期同档基准利率，于每年年初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调整，故自用型和投资型购房者会在年末出现大量提前还款。早在 2004 与

2006 年,上海等地就曾出现借款人提前还款潮,迫使部分银行临时大幅调高提前还款违约金。三是高房价。就投资客而言,购房的主要目的是用于满足其投资需求,获得投资收益。房价超过其预期收益率,投资人会出售住房。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按揭房产未涂销抵押不得出售,这意味着屋主必须提前偿还房贷,才能进行房产转让交易。

以上情景分析表明,在大部分经济环境下,投资型购房者和自用型购房者的还款行为不存在差异。然而当市场处于高房价时,购房者购房目的不同则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行为结果:投资者会为了锁定投资收益以便出售房屋而提前还贷;自用型购房者是为了满足自身住房需求,故会继续正常还贷。

而商业银行更倾向于发放投资型住房抵押贷款,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一是从盈利角度。为了减轻每月还款压力,购房者通常会选择 5 年以上房贷期限,贷款利率按央行 5 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浮动。投资者(特别是投机客)由于房价上升会在 5 年内选择出售住房,这种行为不仅使银行短期内获得长期收益,而且还赚取一笔额外的提前还贷违约金。此外,2009 与 2010 年期间银行房贷政策的放宽,使大量购房者获得 7 折、8 折利率优惠。近些年存贷款利率一路攀升,曾经一度出现了房贷还款利息低于同期定期存款利息的现象,所以出现了银行“破天荒”地鼓励住房抵押贷款人提前还贷。而投资人在高房价时提前还款,会使银行回笼资金高价放贷。

二是从商业银行资本结构角度。个人房贷期限往往较长,从而增加了我国银行业短存长贷之资金结构错配的风险。相较于自用型购房,投资型购房者的提前还贷概率更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商业银行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本无可厚非。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任其发展,为防楼市泡沫,有效调控房价,中央银行应该限制商业银行过度参与贷款业务。总之,相较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房市的影响则更为有力、有效。

15.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稳定性研究

张东祥 刘斯文 张标(武汉大学),《经济评论》2013 年第 6 期

当公司成长、扩张需要扩大资金投入和市场融资时,公司面临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的选择问题。在没有税负、没有证券发行与交易成本、信息对称的完美资本市场中,资本结构即公司负债与股东权益之比不影响公司价值,因此不存在资本结构的选择问题。现实资本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负债不仅能使公司得到税盾好处,而且还能防止经理人肆意挥霍公司的自由现金流,因而能增加公司价值。但过多的负债也会引发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问题而损害公司价值。由于不同的资本结构对公司资本成本和公司价值产生不同影响,因此,资本结构的选择是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关于公司如何选择资本结构,理论上有多种解释,包括静态权衡理论、优序融资理论、市场时机理论以及代理权竞争等。静态权衡理论认为公司会权衡举债的成本和负债的税盾作

用,以此选择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并且当实际资本结构偏离最优资本结构时,公司将朝最优资本结构调整,因此存在最优资本结构;优序融资理论则认为公司不存在最优资本结构,影响公司融资的因素是资金来源的成本和风险,因此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融资时会优先考虑内部融资,当不得不使用外部融资时会先选择债务融资,最后才选择股权融资。

为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变化规律,我们使用非线性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 2002-2011 年的资本结构季度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行业、甚至同一行业内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变化规律存在很大的差别。大部分行业内的大部分上市公司都不存在目标(最优)资本结构,优序融资理论可用来解释这些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变化规律。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存在目标资本结构,静态权衡理论可解释这些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变化规律。

不能用统一理论解释资本结构变化规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市公司所处的环境、上市公司自身特性以及上市公司管理者风险偏好不同。有研究表明:(1)宏观经济状况是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重要因素,因为宏观经济影响公司现金流、信贷风险影响公司借贷行为,同时股票价格也会影响公司融资决策,从而影响资本结构。(2)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自身的盈利能力以及公司所处的发展阶段都是影响资本结构决策的因素。各行业之间公司的资本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可抵押资产较多的公司负债率非常高,例如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而无形资产较多的公司负债率极低,如传播与文化产业上市公司。年轻的、盈利能力较强的公司倾向于使用较少的负债,而成熟的、盈利能力较弱的公司则偏向使用较高的财务杠杆率。(3)管理者特征也对公司资本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可能导致公司激进负债,而那些年纪较大的管理者、女性管理者等则会采用较为保守的负债策略。

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起步较晚,中小企业甚至是上市公司融资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银行贷款存在严重的信贷歧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司的资本结构决策。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能更加容易获得银行贷款,民营企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因此国有企业负债率显著高于民营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和民营企业的“投资不足”,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

为了遵循资本结构选择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建议:(1)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使得优质的公司能够在资本市场上通过发行公司债来筹集资金,而不受银行贷款的限制。(2)完善公司治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减少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提高公司贷款成功率。(3)遵循市场发展规律,适当调控经济,扶持民营企业发展。

16. 公司避税活动与管理层寻租

陈冬 唐建新(武汉大学)

《机构投资者持股、避税寻租与企业价值》,《经济评论》2013 年第 6 期

由于所得税支出占到公司税前利润的 1/3~1/4,所以,直观看法认为公司避税节约现金

流出,将本属于股东的财富保留在股东手中。但是,避税交易大多设计得隐蔽复杂,且具有迷惑性,所以,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公司中,如果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行使经营权的公司管理层借助信息优势和专业技能,可以利用复杂不透明的避税交易为自己谋求私利。例如,对重大财务丑闻安然(Eron)事件的涉税问题进行调查的税收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Taxation, JCT) 揭秘安然公司避税的“斯蒂尔计划”(Project Steele)。为避免巨额虚假税前利润承担税收支出,安然公司向特殊目的实体(special purpose equity, SPE)支付高额费用,时任安然财务总监是大量特殊目的实体的关键所有者。公司管理层及其关系人控制的企业是避税交易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大学迪赛教授的团队对俄罗斯泰科(Tyco)公司避税交易的研究还发现,在税收征管不严格和税率较高的情况下,泰科公司向离岸公司汇出利润,由公司管理层选择交易方。避税行为的复杂性和隐蔽性降低了管理层寻租的边际成本。避税交易设计越复杂越隐蔽,管理层伺机获得私利的机会和租金也越大。寻租反过来可能进一步增加管理层实施避税交易的意愿和行为,使企业避税程度进一步上升。企业避税和管理层寻租之间存在反哺(feedback)关系。

而且,避税寻租行为的负面影响还涉及会计信息质量。避税交易改变现金流,影响会计利润的稳健性和持续性,加剧了公司与会计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些避税交易的相关情况无法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公司的会计信息环境变得更加不透明。所以,公司避税会削弱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控制。

复杂的公司避税交易需要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员进行分析和信息挖掘。机构投资者具备会计、财务、金融等专业知识,拥有掌握数据分析和挖掘能力的专业人员,了解行业发展状况,熟谙企业经营、投融资运作。而且,机构投资者分析和挖掘的私有信息,可以传递给其他股东和债权人,降低企业和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因此,机构投资者可以一定程度抑制公司管理层借助避税谋取私利的行为。

公司避税及其伴生的寻租活动有助于我们理解我国较低的所得税率敏感度的成因。避税寻租导致的效率损失是引起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未成比例变化的原因之一。由于避税寻租活动的存在,公司避税并不一定增加企业价值。当公司治理状况好时,避税伴随的寻租行为受到更多抑制,节税效应才能显现出来。所以,一方面,公司治理状况影响公司税收制度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简化税制和提高税规实施效率,可弱化避税寻租行为,显著改善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状况。同时,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税收方面的信息披露监管,有助于提高对投资者的保护。

理论前沿动态

17. 股市有限参与之谜

尹志超 黄倩（西南财经大学）

《股市有限参与之谜研究述评》，《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

股市有限参与问题属于家庭金融的范畴，家庭金融这一概念首先由Campbell在2006年美国金融年会上明确提出，他将家庭金融确立为与公司金融、资产定价并列的又一新的研究领域，家庭金融主要研究家庭如何在不确定环境下运用金融工具实现其财富目标。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快速增长，投资者参与股票市场的比例在不断提高，程度也逐渐加深，但股票市场有限参与依然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投资组合领域难以解释的现象。外部金融市场环境和内部家庭投资决策是分析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一直以来，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社会舆论都对改善外部金融市场环境的呼声较高，希望相关部门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健全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他们认为股市异常波动和持续低迷抑制了居民长期持有股票的需求，增强股市投资功能是提高家庭股市参与率的关键。不可否认，股票市场有限参与和外部市场环境直接相关，但内部家庭资产选择行为才是矛盾的关键、问题的症结，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转变研究角度和思路，从居民家庭微观层面解析股市有限参与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的金融理论认为所有的投资者都将一定比例的财富投资于所有的股票，投资的比例仅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但由于家庭必须在长期但有限的生命周期内进行规划，家庭拥有的人力资本是不可交易资产、房产是非流动性资产，家庭面临借贷约束和复杂的税收等因素存在，使得许多家庭未参与股票投资，即使参与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也并非持有市场中所有股票，这一现象对于传统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股市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更是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而由于研究角度以及研究样本选择的差异性使得研究结论存在诸多分歧，难以达成共识。

目前关于股票市场有限参与的研究，国外已经取得了大量的实证成果，引入了交易摩擦、人力资本、非流动性资产、人口统计特征、社会互动与信任、惯性、储蓄动机等影响因素。一些国内学者也逐步将以上各因素应用于中国家庭金融研究的实践中，验证其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认为由于交易摩擦（如不允许卖空、买卖证券产生的交易成本和税收）的存在，使得一部分家庭了解市场信息渠道受限、专业知识欠缺，因而没有参与股票市场或者股票投资比例较低。博迪最早将人力资本引入投资组合研究，并认为家庭可以通过增加劳动供给或者推迟退休来应对不利的投资结果，这提升了家庭承受金融投资风险的意愿，因此相对老年投资者，年轻人愿意持有更多的风险资产，而学者们对人力资本中劳动收入风险的影响存在分歧，大部分学者认为劳动收入风险对股票投资有挤出效应，而其他学

者认为存在双重作用、激励作用、不显著等。家庭投资非流动资产（住房和企业资产）对股市有挤出效应。在人口统计特征中，受教育程度与股票投资正相关；年龄与股票投资可能负相关，也可能呈“驼峰”效应，也有学者认为影响不显著；健康与股票持有比例可能正相关，也可能关系不显著；另外，性别、婚姻状况、家庭规模、职业等其他人口统计特征也将影响家庭股票资产的配置。社会互动与信任的加强将提高家庭的股票参与率。家庭惯性（参与惯性与交易惯性）和储蓄动机的不同也将影响家庭的股票参与率和参与深度。

家庭股市参与率是一国经济金融化的重要标志，2012年中国家庭的股票市场直接参与率仅为8.84%，说明我国绝大多数家庭没有参与股市，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的不同对家庭股市参与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应将国外已有的较为成熟的理论与中国文化传统、特殊的制度背景和市场背景相结合，才能更好地系统研究中国家庭股市“有限参与”之谜。

18.贸易持续平稳增长的新方向——国外出口固定投入成本与扩展边际研究新进展

张凤 孔庆峰（山东大学）

《出口固定投入成本与扩展边际理论述评及展望》，《经济评论》2013年第6期

经过几十年持续的关税减让谈判，世界整体的关税水平已大幅下降，数量限制措施也不断减少，世界整体的贸易自由化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技术障碍和监管保护措施所带来的出口固定投入成本成为主要的剩余障碍。通过贸易自由化的方式来促进贸易进一步上升的空间越来越少，各国政府和国际经济组织积极探索贸易增长的新途径，而通过降低出口固定投入成本来促进贸易增长成为了政界、学界和商界关注的焦点。

9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使用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企业是异质的——一个行业内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共存，出口企业较非出口企业生产率更高，规模更大。另外，研究还发现，现实中所观察到的贸易流要小于传统贸易理论的预期值。且按照标准新贸易理论来看，所有的多样性品种都应该被贸易，但现实中却发现双边贸易中存在大量的“零值”贸易产品，似乎贸易被“遗失”了，特勒副勒尔（Trefler）（1995）将这一现象称为“贸易遗失之谜”。

异质性企业以及“贸易遗失之谜”的存在对以往以同质性企业为假设的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也导致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研究热潮。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出口固定投入成本的存在是“贸易遗失之谜”产生的主因，它认为特定市场的出口固定投入成本不仅影响企业进入或退出出口市场，而且也影响多产品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种类，而这些都表现为在扩展边际上的变化。

严格来说，扩展边际的概念最早源于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里在描述消费者是否进入某种商品市场时涉及到扩展边际的调整。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的扩展边际也有类似的含义。从跨部门截面维度看，扩展边际经常被定义为出口产品种类的范围或者出口企业的数目；从时

间维度看,扩展边际的增长主要指的是新出口产品的种类,旧产品出口到新的目的地或者出口企业数量的增长。可以看出,扩展边际的确切定义随着研究背景的不同而改变。

目前,出口固定投入成本对扩展边际影响的研究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大量研究发现扩展边际在一国抵御经济波动冲击、促进贸易稳定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其贸易促进的作用更加明显。

梅里兹 (2003) 最先在异质性企业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中系统分析了出口固定投入成本对基于企业/产品水平扩展边际的影响。随后,不同学者对其研究进行扩展,例如,一些学者在假设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的情况下研究贸易矩阵的“零值”,替代弹性不同的产品对贸易壁垒变化的反应,贸易便利化政策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等问题;还有学者从影响出口固定投入成本的微观因素切入,研究由于出口企业间信息网络建立而产生的“溢出效应”/熟悉程度对出口固定投入成本进而对扩展边际的影响;另外还有学者针对现实中大量多产品企业的存在,研究出口固定投入成本对基于某一特定企业出口产品集/分布的扩展边际的影响

上述研究为我们从出口固定投入成本和扩展边际角度探讨贸易的稳定增长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这些研究着眼点不同,但关于出口固定投入成本对扩展边际影响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出口固定投入成本降低能够带来基于不同纬度的扩展边际的增长。未来研究应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在影响出口固定投入成本性质和组成的微观基础、出口固定投入成本对多产品企业的产品集/产品分布的影响等方面继续深入。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创刊于 1980 年，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本刊坚持“让思想引领学术、以学术砥砺思想”的基本理念，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学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本刊设有中国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研究、经济理论探索、理论前沿动态等栏目，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 来源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2012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精品期刊。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 27 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 28 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在最新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全国 69 种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中，《经济评论》排名第 4；在最新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全国 25 种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核心期刊中，《经济评论》位居第 5；在《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2 版）》中，《经济评论》被评为“2012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在全国 34 种（Top5%）人文社会科学类“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中排名第 12。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http://jer.whu.edu.cn>）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er@163.com
